

文献所见《宋璟碑》考略

赵彦辉 李少鹏

摘要：《宋璟碑》是颜真卿所书的名碑，在书法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历代著述中对于《宋璟碑》的记载不一。本文从历史文献入手，论证了《碑侧记》虽不著书者姓名仍为颜真卿所书。但原碑很早已经不见于世，行世的其实是水平低劣的“范致君翻刻本”，而且无论是翻刻本还是原碑都被剜刻。

关键词：颜真卿；《宋璟碑》；翻刻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1)04-0018-05

笔者近对《宋璟碑》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时，发现对《宋璟碑》的研究仍有空间，今对问题的思考整理成文，以就正于诸方家。

一、《宋璟碑》基本情况

《宋璟碑》，全名《有唐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省右丞相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铭并序》，又名《宋广平碑》、《宋文贞碑》等。四面刻字，位于河北省沙河市十里铺村宋璟墓前，为唐颜真卿所书。碑首成半圆形，高 135.5 厘米，浮雕缠尾四龙。碑额为方形，高宽各 60 厘米，篆书“大唐故尚书右丞相赠太尉文贞公宋公神道之碑”。全碑高 289.5 厘米，宽 149 厘米，厚 42.5 厘米。碑正面及碑阴正书各 27 行，行 52 字，右侧正书 7 行，行 50 字。该碑为宋璟之孙宋俨于其去世 35 年后所立，碑立于唐大历七年（公元 772 年）九月。左侧正书 10 行，行 70 字，为大历十三年（公元 778 年）三月颜真卿追记^①。

是碑因颜真卿所书，又为记录名相宋璟之事，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现将笔者所能见到的历代金石家著录情况统计如下：

年代	作者	书名卷数	版本	附注
宋	欧阳棐	《集古录目·卷八》	云自在盒丛书本	原书已佚，据清繆荃孙校辑
宋	赵明诚	《金石录·卷二十八》	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	附碑侧记
宋	陈思	《宝刻丛编·卷六》	十万卷楼丛书本	附碑阴（当为碑侧记）
明	都穆	《金薤琳琅·卷十六》	学古斋金石丛书本	附碑侧记
明	丰坊	《书诀》	四明丛书本	
清	孙承泽	《庚子消夏记·卷六》	学古斋金石丛书本	
清	顾炎武	《金石文字记·卷五》	亭林遗书本	
清	叶弈苞	《金石录补续跋·卷七》	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	

①范玉琪《沙河东户颜真卿撰并书〈宋璟碑〉考》，《文物春秋》1991 年第 3 期。

收稿日期：2010-03-28

作者简介：赵彦辉（1974-），吉林榆树人，北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书法文献、书法史。

李少鹏（1986-），河北沙河人，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专门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清	叶弈苞	《金石录臧跋·卷六》	陶风楼影印本	
清	林侗	《来斋金石刻考略·中卷》	春晖堂丛书本	
清	李光瑛	《观妙斋藏金石文考略·卷十一》	雍正七年刊本	转引《金薤琳琅》、《弇州山人稿》、《庚子消夏记》、《容台续集跋·仿宋广平碑侧帖》、《归有光集》文，自加按语
清	钱大昕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七》	潜研堂全书本	附碑侧记
清	武亿	《金石三跋·卷三》	授堂遗书本	
清	王昶	《金石萃编·卷九十七》	经训堂本	转引《金薤琳琅》、《金石录》、《弇州山人稿》、《归有光集》、《竹云题跋》、《金石后录》、《来斋金石刻略》、《潜堂金石文跋尾》、授堂金石跋》文，自加按语
清	赵绍祖	《古墨斋金石跋·卷五》	聚学轩丛书本	附碑侧记
清	洪颐煊	《平津读碑记·卷七》	木犀轩丛书本	
清	陆增祥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六十三》	嘉业堂刊本	仅碑侧记，转引《平津读碑记》文，自加按语
民国	罗振玉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卷四》	永丰乡人稿本	

二、《宋璟碑》及《碑侧记》相关问题

清刘熙载《书概》称“《宋广平碑》纤于蕴藉，令人味之无极”。^①清代王澐《竹云题跋》称“颜书多以沉雄痛快为工，独《宋广平碑》纤于跌宕，以韵度胜。碑侧记无意求工，而规矩之外别具胜趣，尤其是颜书第一合作。盖前碑直入神品，而碑侧更居逸品矣。”^②此碑地位可见一斑。然该碑知名度不比颜真卿其他作品如《多宝塔》、《麻姑仙坛记》、《东方朔画赞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即该碑于在北宋末就不见著录，可能此时该碑原碑已经不见于世。上表统计中陈思乃宋代最晚著录者，陈思约为宋理宗（1225-1264）时人，但陈思本人并没有见到碑拓，陈思的记载是抄自《集古录目》和《金石录》。唐末一直到宋时今天河北南部一带兵戈横行，加之明代沙河知县方豪从土中发掘出原碑“点画如初”，推断该碑原碑可能在宋末埋入土中。直到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才被重新发掘出来，且已经断为两截^③。

此碑书于唐大历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当时颜真卿六十四岁，根据《颜真卿年谱》，上一年六月颜氏书《大字麻姑仙坛记》，本年五月书《八关斋会报德记》，本年十一月书《臧怀恪碑》和《元结碑》，后一年书《竹山堂连句》，后四年书《李玄靖碑》^④。通过比对可以发现，书《宋璟碑》时，正是颜真卿书法转变的重要时期，从《大麻姑》时期的方正气象开始向《竹山堂》、《李玄靖》的奇肆转变的消息正包含在《宋璟碑》中。此碑堪称颜体书法转变之枢要。但很遗憾的是笔者没有见到宋拓本，现存的较早的拓本鉴定为明拓割裱本，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文物出版社于八十年代曾影印出版。

后人对于《宋璟碑》的评价极高，对其《碑侧记》评价尤高。翁方纲《复初斋文集》说：“颜楷以《宋广平碑》为最善，而其碑侧小楷书古朴淡远，尤颜楷所罕见。”甚至认为这是“颜书第一”，并将之列入《唐碑选》中。王澐也认为原碑是“神品”，《碑侧记》可以称为“逸品”。仔细观察《碑侧记》的笔法与碑文不同，这可能是由于碑侧记的字体偏小，而且凿刻比正文晚六年，此时颜真卿的书法造诣更臻完美。但由于在侧记中没有说明“颜真卿撰并书”，只云“颜真卿记”，因此在严谨学者的记载中，对碑侧记的

①[清]刘熙载《艺概》，《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705页。

②[清]王澐《竹云题跋》，《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621页。

③《畿辅通志·金石十》卷147，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635册，第267页。

④朱关田《颜真卿年表》，见《中国书法家全集·颜真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7页。

书写者付之阙如，如：

“右唐宋璟碑侧记，颜真卿撰。正书，无姓名。”（《金石录·卷八》）

很多文献抄录了这一则材料，但有文献在录此则时有误，如“唐宋璟碑阴，唐颜真卿撰，正书，无姓名，大历十一年春三月立附。”^①陈思仅仅二十九字的记载中就出现两处错误：1. 并不是碑阴，而是碑侧记（或称背阴记），该碑碑阴同样为颜真卿所书；2. 碑侧记追记的时间是大历十三年，并不是“大历十一年”。诸如这种以讹传讹之不严现象常有发生。但也有人注意到“侧记笔法，与碑不同。”^②会不会碑侧记不是颜真卿所书？

更多学者认为碑侧也是颜真卿书：

“右唐宋文贞公碑并碑侧记，皆颜鲁公撰并书。”^③

“碑侧记，颜真卿撰并正书。”^④

“碑侧记亦鲁公撰书。”^⑤

从现存的拓本来看，该碑侧记的确没有提到是颜真卿撰并书，只是说“颜真卿记”。对学者而言，对碑侧记的书丹者阙而不录是严谨的。这当然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但更多的人主张碑侧记和碑文同为颜鲁公所书。从拓片的书法上讲碑侧记属颜书体系，因此定为颜真卿所书似乎问题不大。但欧阳辑指出“笔法与碑不同”的问题，又如何解释？

查颜真卿年谱，其书《碑侧记》时是在颜氏七十岁时，是年正在吏部尚书任上^⑥，也就是此时颜氏正在长安（今西安），对于七十岁的老人而言，亲自来到千里之外的宋璟墓前似不可能，而把《宋璟碑》搬回长安书丹则更不可能。因此若为鲁公所书，必定书于纸上，然后刻工摹勒上石。此时碑已立入碑趺，刻工只能站立作业，镌刻必定多有不便，则失真之处在所难免。宋代米芾的一则记载可以说明：

“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披撇，致大失真。”^⑦

颜真卿本人并不在意镌刻的失真。完全存在此《碑侧记》在镌刻的过程中刻工对颜书出现误读的可能性。正如魏碑刻手的“二次创作”造成了“笔法与碑不同”。可以推断：颜真卿的多变的书法风格跟刊刻过程中的失真不无关系，这一点米芾已经注意到，此不赘述。

颜真卿书《碑侧记》没有署“颜真卿撰并书”还可以有另一个解释：在颜氏所写的其他碑铭中所有的碑侧记、背阴记都不记“撰并书”，^⑧可能是为了避免重复。而如果为他人所书，此人必会声明“颜真卿撰，某某书”。此虽然没有明言，《碑侧记》必是颜真卿所书。

三、“范致君翻刻本”是否存在

如上所述，既然《宋璟碑》的书法水平很久以来已经得到人们的肯定，而且方豪也记载他从土中掘出原碑，为什么还有人认为“或以为久埋土中，明末出土者，诬也”^⑨？为什么在金石著录中关于“宋翻刻本”都没有明确记载？

答案可能就在所谓的“范致君翻刻本”（以下简称“范本”）上。

在明代都穆的《金薤琳琅》中摘出了“范本”在碑侧后面的题跋，应该引起的重视：

“宋公神道碑独完好，惟碑侧记阙八字。去官道二里余，世罕知者，以故久不显于世。致君因谒墓下始得之且难。旧史不载，新书阙疑，乃刻颜公体大书字画，别刻于石，庶久其传。邢惟襄国旧都，邱冢累然，类皆湮灭于无间，独公之墓高不逾丈，丰碑尚存，岂独忠义足以垂名于不朽，世亦以颜鲁公为贤，而

①[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六》第41页。正文表中已载版本，不重出，下同。

②欧阳辑《集古求真·卷五·真书》，江西开智书局刊本，1923年。

③[明]都穆《金薤琳琅·卷十六》，第13页。

④[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卷三》，第3页。

⑤[清]洪弈煊《平津读碑记·卷七》，第10页。

⑥朱关田《颜真卿年表》，见《中国书法家全集·颜真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7页。

⑦[宋]米芾《海岳名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61页。

⑧[唐]颜真卿《颜真卿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⑨欧阳辑《集古求真·卷五·真书》，第11页。

此碑尤为可贵也。墓之东有碑（缺二字）之祖，赠邢州刺史，为居民斧而剥之，所谓侧门是也。自衡之后，子孙无显宦于唐，今有隶编户者，犹收公诰官置墓田，俾耕以守，诰为前政，去取莫知。所在大宋崇宁二年七月一日，编修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范致君记。”^①

这则史料很多著录都提到，但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刻颜公体大书字画，别刻于石，庶久其传”。也就是说，当年范致君曾经翻刻此碑，而且距离原碑不远，而原碑在之后不知多久，断为两截，埋入土中。

众所周知，在清代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访碑”的风气，《寰宇访碑记》等书极尽搜求，但几乎没有人记载“范本”。而且在1981年文物普查的时候，多方打听也没有找到此“翻刻本”的线索。那是不是有可能“范本”是子虚乌有，根本没有存在过呢？

明代正德年间的沙河县知县方豪曾写《断碑记》中述及此事。可惜方豪《断碑集》在乾隆时尚存于世，现在已经无从查找，大约已经亡佚。在《四库全书》中仅存其目，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节录如下：

“宋崇宁中，有编修国史会要所检阅文字范致君者，别书一碑易之，而旧碑遂不显。正德中，豪始求得原石，已断为二，乃镕以铁而复建之，……”^②

在《畿辅通志》中可以看到更详细的记载，“（方豪）初至沙河，闻有唐相宋文贞公墓，墓有颜鲁公碑。而未及谒，先取其碑文（实际上是拓片）观之，中有缺字，字画丰肉，疑非颜书。”于是他在墓地发现“范本”，果然不是原碑，其先前拓本也是依据“范本”而拓。经进一步寻找，终于在墓地周围草丛中“见一断碑，乃鲁公所书神道碑铭”。之后他率领四百人将断碑用铁箍好，重立于墓侧，并建碑亭。^③说明在宋代范致君之后，很多人见到的拓本实际上是范致君的翻刻本，并不是原碑，四库馆臣也承认“旧碑遂不显”。而且从这一则记载中也可以发现，如果在明正德年间翻刻碑仍立在原处，那么原碑虽然不知何时埋入土中，但“范本”一直在墓侧。从吴式芬的《金石目录丛编》和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中也可以证明：

“宋重书宋文贞公碑侧记，唐颜真卿撰，范致君行书，崇宁五年。”^④

“又有宋人翻刻碑侧记。”^⑤

这就说明“范本”真的存在。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说方豪见到了全部的“范本”，为何吴式芬和钱大昕只是说有宋人翻刻的碑侧记（而且翻刻的水平并不高^⑥）？

四、“范本”真面目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做出如下的猜测：范致君当年翻刻之后仅在碑侧记说明这是翻刻本不是原碑，而在其他地方一切照旧复制。这种可能性存在吗？

完全可能。前人在进行金石著录的时候很少看到原碑，只是依据手中的拓片作出评价。更关键的是：此碑的原碑久已不见于世间，无从比对，也就无从考证，同样是“范本”拓片，人们很可能以为其他三面是原碑。这也正好解释为什么钱大昕和吴式芬说只见到宋人翻刻碑侧记，而更多的学者没有著录“范本”（他们以为这就是原碑）。从逻辑上讲是合理的。

都穆的《金薤琳琅》的按语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按：范致君跋谓碑侧记缺八字，今读其文，完好无缺，惟前碑缺九字。考之拓本良然。但细玩此碑笔画，似已磨灭重经开刻者。故碑文与此书（作者注：指都穆家藏《颜真卿集》）所载时有小异。”^⑦

都穆所见到的拓本是前碑缺九字，侧记不缺字本。但根据范致君的记载早在宋代时碑侧记已经缺八字。前代已缺，后代反不缺，而且都穆见到的是方豪赠予的新拓，说明碑侧记在明出土前就已被剝刻。而且都

①[明]都穆《金薤琳琅·卷十六》，第13页。

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第2-401页。

③光绪本《畿辅通志·金石十》卷147，《续文贞公神道碑记》。

④[清]吴式芬《金石目录丛编·卷三之二·顺德府》，文禄堂刊本，第64页。

⑤[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卷三》，第3页。

⑥吴式芬说“范致君行书”说明范氏的临刻是很草率的，把正书临成行书，“解散唐法”也符合宋人“尚意”书风的追求。

⑦[明]都穆《金薤琳琅·卷十六》，第15页。

穆原碑拓片和翻刻本的拓片都见到了，否则他不能抄下范致君的跋记，断碑也不可能只缺九个字。《沙河县志》的记载也可以证明此前行世的《宋璟碑》全是“范本”，并不是鲁公原书：“其碑果宋人范致君书，碑侧有述……故凡得是碑者，概以颜书，不复辨也。”^①

欧阳辑曾见多种拓本，并比较其优劣：

“原石久已鐫剝，故其字肥瘦相參。瘦者原刻，肥者剝改也。”^②

“今以数本核之，其初拓仅剔阴面，其次剔阳面之下每行五六字，其后则全面俱多鐫伤。可以以鐫字之多寡，验拓本之先后。更易于辨别也。然仅剔阴面者殊不多见，殆明初拓本也。”^③

欧阳辑生前和马衡友善，后者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其见到的拓本一定为精拓。且他曾经“以数本核之”，得出的结论就更具有权威性。上文曾引欧阳辑认为“或以为久埋土中，明末出土者，诬也”的原因就是他见到了他认为可能是明初拓本的版本。其实他的推断并没错，他见到的的确可能是明初拓本，但那是“范本”。

这样一来，他并勘的结论就能帮我们推断翻刻本的真实面目了，综合以上的分析：“范本”其他三面都是原碑仿制，字比原碑稍肥，在碑侧记下作跋说明为翻刻本，略带行书意；未断；其在明朝前后被剝刻，而且是被先剝阴面，之后是阳面每行下五六字，之后是阳面全部；因为“范本”的碑侧记记载了这是翻刻本，其碑侧可能没有被剝刻，但原碑的碑侧早在明出土前已经被剝刻。

原碑在何时被剝刻呢？据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记载崇祯己卯（公元 1639 年）他曾经亲至碑下，虽有剥蚀，“尚可抚摩”，二十年后他又收到朋友赠予的新拓，“大不如二十年前者矣”。可见，原碑被剝刻是在明末清初的几十年里。

很遗憾现存的材料尚且不足以证明某本一定为明初拓本，由于“范本”原石也无法找到，即使找到原石也可能早经后人剝刻得面目全非。因此关于《宋璟碑》的版本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来证实。但可以肯定：现存《宋璟碑》拓本中，应该还有“范本”存在。甚至越早的拓本，越有可能是“范本”。

自从方豪得到原石之后，《宋璟碑》开始受到明朝人的重视，相关著录中也屡次提到：

“锥沙三喻皆喻藏锋，不知出锋亦有之。因出锋之遒，故成藏锋之浑，此碑（作者按：即《宋璟碑》碑侧）是也。东坡偃笔，虽形类颜，失在用笔矣。其学王僧虔亦然。”^④（《容台别集》）

“右丞相宋文贞公碑，在广平府”^⑤

“余最爱颜鲁公书，多方购之，后亦得其数种……宋文贞公碑阴记……”^⑥

“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贞碑》的《瘞鹤铭》法，详观其（作者按：即《宋璟碑》）用笔意，审如公说。”^⑦

至于清人就更多提到了，但由于清朝时大行考碑之风，金石拓片行情日好，书商为求得高价，原石已经遭到剝刻。据载，在清末北京坊间也有翻刻本^⑧，但由于缺乏善本，加上无论是原碑还是“范本”都已被剝刻，《宋璟碑》渐渐的又淡出了人们视线。一直到 2006 年《宋璟碑》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其保护已经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可以肯定《宋璟碑》在历史上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原因固然是原碑埋没土中，或者该碑位于“穷乡僻壤”，绝少人知。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范本”仍然在世，而且水平低劣，绝大多数学者都以为这就是“原碑”而低估其价值。在方豪发现原碑之后不久也遭到剝刻，导致面目全非。这可能是《宋璟碑》不行于世的真正原因吧。

（责任编辑：黄云鹤）

①《畿辅通志·金石十》卷 147，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 635 册，第 267 页。

②欧阳辑《集古求真·卷五·真书》，第 11 页。

③欧阳辑《集古求真续编·卷二》，江西开智书局刊本，1923 年，第 7 页。

④[明]董其昌《仿颜鲁公书宋广平碑侧帖》，见《容台别集》。

⑤[明]丰坊《书诀》，四明丛书本，《历代书法论文选》选编时删去此则。

⑥[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七》，见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59 年，第 254 页。

⑦[明]潘之琮《书法离钩·卷八》，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39 年，第 75 页。

⑧见欧阳辑《集古求真·卷五·真书》，第 11 页。